

民国时期上海济生会的慈善实践

中华民族具有乐善好施的传统,修桥铺路、施茶施药、救荒赈灾、抚恤孤寡、收养弃婴、施棺助葬等慈善举措,历代绵延不绝。民国时期,战乱频仍,灾荒不断,民间慈善机构大量涌现。近代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、航运中心、贸易中心和工业中心,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慈善事业的开展奠定了基础。上海的一些善心人士组织慈善团体,四处募集资金,进行赈灾救荒等活动,其救助范围遍及全国各地,为减轻灾难损失、挽救灾民生命、稳定社会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其中,上海中国济生会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慈善团体之一。



顾家弄 20 号的独立小洋楼,据说为顾家人所建产业中的其中一幢,被捐给上海济生会用作会所

董事制结构管理

上海济生会前身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民间团体集云轩,成立于 1915 年冬,旨在劝人为善,加入者多为商人。为了更好地开展慈善事业,1916 年 10 月 25 日,旅沪各省慈善家成立了专门的慈善组织——上海中国济生会(以下简称上海济生会),以“研究道德、实行慈善事务以增进中国公益为宗旨,政治时事概不预闻”。办公地点开始在上海公共租界宁波路升安里 361 号,后来迁到宁波路顾家弄 20 号。

上海济生会分六科:交际科、经济科、文牍科、庶务科、调查科、审核科。不同于旧式慈善团体,它采用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——董事制进行管理。董事会由各科主任组成,另设正、副会长。1927 年 4 月,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改董事制为委员制。组织结构完整,职能部门健全,各部门分工明确,保证了各项慈善任务能快速、高效地完成。

上海济生会筹集善款的方式主要有三条途径:一是由济生会会员通过个人的关系来募集;二是借据、申报、广播等媒体刊登广告进行募集;三是发行慈善彩票来筹款。

上海济生会募集到的善款数量巨大,主要来自富商、社会名流、政府官员、公司、银行、钱庄、商号、商会、同乡会、同业公会等。善款主要用于四类慈善事业:一是施医、赠药、安老、恤嫠等普通慈善事业。如 1919 年 9 月,上海济生会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宝兴路口开办济生医院,为贫民免费提供诊疗服务。二是遇水旱、饥荒、兵燹等天灾人祸时,进行赈灾和救护等临时慈善事业。三是设立正蒙院、初等小学等教育慈善事业。四是垦荒、筑堤、疏浚河道、造桥修路等实业慈善事业。

上海济生会用于机构日常开支的经费很少。慈善捐助项目以及善款使用情况会采取登报等方式向社会公布,并且每年都要出一本收支报告册。会员们都是义务为济生会工作,机构工作人员也都廉洁勤勉,未见有违规贪墨的情况发生。

三十余载慈善史

上海济生会在苏州、宁波等地还设有分会,在北平设有办事处,其赈灾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,每年花费高达几十万

元,有些年份甚至高达一百多万元。善款主要用在灾民身上。如 1925 年起,四川连续三年大旱,颗粒无收,饿死 10 多万人。上海济生会派专人前往通江、巴中、南江等地放赈。1928 年至 1930 年,陕西连年干旱,饿殍遍野。全省 1300 万人,饿死 300 万人,流离失所者有 600 万人。上海济生会在陕西武功等地开办粥厂、放粮,成立灾童收容所(尸体)掩埋队等。1930、1931 两年在陕西救灾即花费 30 余万元。1931 年,长江流域发生大洪灾,上海济生会联合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,派人携带面粉万包,药品数万瓶,前往武汉赈灾。在灾疫严重的汉口开办了一所时疫救济所,施诊施药,救济病人。

上海济生会在战争时期,临危不惧,深入战场进行救护。如在 1932 年“一·二八”抗战时期,上海济生会组织了白十字救护队,冒着炮火硝烟,先后共救出伤兵 600 余人,灾民 4000 余人。部分灾民送回籍,其余分送济生会开办的 4 个收容所。济生会还代红十字会在静安寺路张家浜组织开设第 24 伤兵医院,收治伤兵 120 余人,其中重伤员超过半数,仅 3 人去世,其余均康复。上海济生会还在上海设立了 4 个难民收容所,收留难民 4000 多人;在苏州设立了 7 个难民收容所,收留难民 4000 多人。1937 年“八·一三”抗战时期,上海济生会共开办 3 处收容所,救护了大量伤兵和难民。

1938 年后,受日军侵略影响,上海经济萧条,上海济生会经费大幅减少,工赈、急赈等暂停。抗战胜利后,经费更为拮据,慈善活动一度停顿。1949 年 5 月,上海解放,上海济生会的慈善救济活动勉强维持,且只限于本市。到了 1950 年代初,上海济生会宣告解散。

以工代赈的先行者

民国时期,灾难频仍,主要是水、旱灾和兵灾,发生频率很高。上海济生会除了直接派人员前往灾区赈灾外,主要采取三种形式救灾。

一是直接向灾区捐钱。民国十七年,旱、蝗两灾过后第二年,山东本已民不聊生,谁知又来兵灾。日军为阻止国民革命



图为《代放山东莒县利津等县赈面等项十八年春账册》,登载巨细,可见上海济生会复核工作之认真

军北伐,五月在济南制造骇人听闻的“五三惨案”,中国军民被杀 6000 余人,伤 1700 余人,许多百姓流离失所。战事平息不久,上海济生会就立即向济南开展救济活动。该会分别向济南的几个慈善机构捐款,委托他们向灾民发放。如世界红卍字会济南分会一张收条云:“今收到周敬甫君交到上海中国济生会急赈洋贰仟元,代放受伤乏食之人。世界红卍字会济南分会。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廿六日。”中国红十字会济南分会一张收据云:“今收到上海济生会捐款大洋一仟元,代放急赈。除送会计核收,并登报征信外,特给收据。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。中国红十字会济南分会会计处(红印)。”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一张收据云:“今收到上海济生会现大洋一仟元正,代放急赈,立此收据为证。刘向忱、于耀西、叶功甫、伍啸鑫押。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。”向当地的慈善机构或组织捐钱,让他们代放赈,有个好处就是当地人熟悉当地情况,便于运作,也大大提高效率。

二是捐实物,主要是粮食和药品。如民国十六年至十八年,山东因特大蝗灾而发生饥荒。上海济生会开展赈济。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一张收据云:“今收到中国济生会捐助本会赈款(指助曲阜)济生丹肆仟瓶、济生水肆仟瓶。常务委员兼主席许世英、常务委员王震、常务委员刘镇华、常务委员汪守珍、常务委员朱庆澜。”又如世界红卍字会烟台分会收据云:“今收到

青岛红十字会交来济生会赈福山灾捐面粉一佰袋。应发存证。经收:承荷、承珂。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十七日,世界红卍字会烟台分会具。”山东牟平红卍字会一张收据云:“今收到青岛红十字会李会长交上海济生会助赈牟平灾民面粉一佰袋。应发存证。经收:承虔。民国十八年七月廿一日,牟平红卍字会具。”民国二十年(1931),中国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,灾难涉及 8 个省区,受灾总人口计五千多万,有 40 多万人死亡。当时上海各界成立了“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”。一张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寄给上海济生会的信笺上写道:“敬复者,顷准大函,并承捐助四号面粉壹千包,附阜丰面粉厂栈单一纸到会,具见轸念灾胞,热心救济,曷胜感佩!当经掣具印收一纸,交来人带奉,谅荷察存。除将上项面粉转运山东,交本会陆查振主任伯鸿择最重灾区散放,一面专登报端鸣谢,奉扬仁风外,相应函复申谢,敬希察照为荷。此致中国济生会。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启。会长孔祥熙,副会长许世英、吴铁城、叶楚傖、王正廷、王震。”这些都是向受灾地区捐实物。

三是以工代赈,包括捐钱、捐粮、贷款等。捐钱如济南华盛义运输公司一张收条云:“洛口河堤裂缝,水患堪虞。现在济案发生,政府不能派人修理。今承周敬甫先生代请上海中国济生会拨以工代赈洋壹千元,如数照收。当即交工兵营兴修。愿负责监工,具此收条存照。负责人杨谦斋。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十八日。”洛口,即洛口,位于济南北部,为黄河重镇。济案,指前述“五三惨案”。这笔以工代赈款是由周敬甫代杨谦斋向上海济生会募得,专门用于修理洛口黄河岸堤的裂缝。

捐粮如山东赈务委员会出具的收据:“山东赈务委员会,今收到上海济生会捐助利津工赈四等面粉捌仟袋,计值大洋贰万元整。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廿二日。”从前,黄河利津段经常决堤泛滥。上海济生会所捐的这批面粉数量巨大,是专门提供给参加黄河利津段岸堤维修工程的民工的口粮。

还有一种以工代赈是用贷款方式来帮助灾民。如山东华洋义赈会寄给上海济生会的一封信写道:“敬复者,顷接七月十四日来函并附件均已诵悉。查敝会在冀南鲁西办理掘井贷款,所有应行试办县分及井数早经分配完竣,款亦扫数拨出,罄告无余。现各县井工已次第完竣,即将结束。承示平阴县政府欲贷款掘井之处未能照办,抱歉之至!除径函该县政府查照外,相应函复,即希察照为荷!此致上海中国济生会。山东华洋义赈会启。十八年七月二十日。”这是贷款给灾区挖井,用来解决旱灾造成的当地百姓用水问题。

上述赈灾举措主要是委托灾区的慈善组织或相关机构进行捐助。除了要求收捐机构开具收据外,上海济生会还要求对方在赈灾结束后提供捐助款物的明细账册,有专人进行审核,以确保所捐款物全部用于灾民。

上海济生会救济的范围很广,以上列举部分原始档案,管窥一斑而已。虽然大多数时候,捐助只是杯水车薪,但该机构的慈善善举还是值得称赞和发扬的。其组织架构合理,善款使用严格、规范,杜绝了贪墨,从未出现过丑闻,其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。(据澎湃新闻)